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

□ 郭齐勇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蕴含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总体的或分别的“道”与“理”,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是作为学科建制的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可以断代或分门别类或个案地做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范式转换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又设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哲学有了被客观公允对待的契机,新研究范式的引入使传统诠释更贴合经典。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逐渐扬弃了“思想文化决定论”与视自家文化如粪土、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更加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客观理解与评价,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发掘、阐发、调动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使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健康、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力图通过挖掘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靠依傍、移植、临

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某家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例如,现象学、解释学等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有关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方兴未艾。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的努力表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碰撞与交融。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与这种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以及有弹性的、动态统一的、两端互济式的中庸方法论。中国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的意识,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相整合,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相结合。

成就斐然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以下,我们略为介绍儒家哲学、经学、道家道教与佛教、生态伦理、少数民族哲学、哲学系统的新建构等的发展现状。

关于先秦儒学,孟子与荀子哲学相继成为热点,这是因为孟子有道德形上学、心性论和政治理论的

原初形态,而荀子的礼学、知性精神,现实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儒学发展有着不同于孟子学的独特意义。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除了少数以新视角、新问题切入外,那种主要在主要人物上扎堆研究的现象已完全改变,学者们大都转入理学大家的门人弟子与后学群体研究或研究学派研究,理学的地域性研究、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学的偏向非常明显。这也说明那种老旧的研究范式所开辟的理论空间越来越小,需要我们引进新的诠释框架或研究范式,而能否对历史上的大家哲学进行新的诠释,则是重要的考验。

关于儒家伦理,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话题:一是以德性伦理学来诠释;二是围绕“亲亲相隐”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以德性伦理学诠释儒家的思潮与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有很大关联,其背后所关注的其实是人的道德品质与实践问题。学者们在德性伦理学的视野中,来发掘儒家伦理中注重道德情感的面向。儒家的修养功夫论也得到重视,并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契机。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争论已有十多年,前后可分为三阶段,焦点问题有亲情是否只是血缘私情而无超越的根源、中西隐制的理论基础、出土文献引起的文本新诠释。

与民间国学热呼应的是学院派经学热,近年的经学研究在经典注疏与阐释,经学家思想,经学史,经学与子学、史学、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经学的现代化、经学学科化定位,经学方法论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入探讨。经学史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以唐、宋、明、清为主,经典则以《易》《礼》《春秋》《四书》为主;在学科定位方面,当经学在现代遭遇价值与学理的两重挑战时,学者们比较赞同以大经学的综合或一元统合的研究范式来弥补缺憾,更好地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的时代学科学划分的不足,同时培养学术兼通、训诂与义理、辞章与考据兼备的综合性人才;反对完全对

象化的研究态度,支持经典诠释的立场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总体来说,当前经学研究的独立性慢慢凸显,这体现在研究范式、所注重的文本、人才培养理念与研究队伍等多个方面。

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与道教研究热以来,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近十几年又有新进展。就研究视角而言,有生态、科技、女性观、民俗学、伦理学等。人物研究以庄子居多;道教教派研究以全真教为热点;地方性道家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当然,道教研究今后还需在宗教比较、道教义理等方面加强。此外,由于近20年来新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如郭店楚简、北大汉简,许多文本得到准确注疏与重新诠释,尤其是《老子》与黄老学派。今后,新出土文献仍将继续对道家哲学及整个中国哲学文本的新诠释发挥作用。

佛教研究涉及其伦理、美学、生态等哲学思想之发掘,戒律或制度文化、佛教地理学或地域性佛学、宗派互动与比较研究、社会影响、僧尼群体、佛教传播史等方面的考察。而随着学者们对印度原始语言的掌握,原始佛教经典与学派及经典译注问题的研究亦逐渐增多。汉传佛教中的禅宗与净土宗不断有新著出版,藏传佛教的研究则热度不减。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释道,乃是一种超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注疏与阐释,经学家思想,经学史,经学与子学、史学、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经学的现代化、经学学科化定位,经学方法论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入探讨。经学史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以唐、宋、明、清为主,经典则以《易》《礼》《春秋》《四书》为主;在学科定位方面,当经学在现代遭遇价值与学理的两重挑战时,学者们比较赞同以大经学的综合或一元统合的研究范式来弥补缺憾,更好地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的时代学科学划分的不足,同时培养学术兼通、训诂与义理、辞章与考据兼备的综合性人才;反对完全对

向,着重回答:政府怎样在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同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政府怎样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坚守公共伦理,超越自利性诱导的诱惑;政府怎样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建立保障机会平等和包容差异的制度平台。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切实解决好行政实践中维护公共权威和提高政府公信力有机统一的问题。政府绩效评价标准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评判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创新和工具改进的问题。因此,西方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和政绩评价标准,对提升中国政府的行政科学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绝不可奉为圭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生态下,行政哲学研究首先要从“谁来评判、让谁满意”的哲学高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和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决定了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必须对政府行为“为了什么”、行政改革“追求什么”等行政价值问题作出旗帜鲜明的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创新行政哲学价值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绝不能仅仅根据管理学的技术性标准和方法去建构行政哲学,而应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行政运行价值论的根本目标,将流程再造、机制创新、能力提升、质量改进等视作落实政府“放管服”改革的途径。

二是坚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取向的价值规范,切实解决好行政行为中公平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机统一的问题。行政哲学研究固然不排除对效率价值的重视,但是首先要贯彻好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着重回答:政府怎样在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同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政府怎样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坚守公共伦理,超越自利性诱导的诱惑;政府怎样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建立保障机会平等和包容差异的制度平台。

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切实解决好行政实践中维护公共权威和提高政府公信力有机统一的问题。政府绩效评价标准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评判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创新和工具改进的问题。因此,西方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和政绩评价标准,对提升中国政府的行政科学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绝不可奉为圭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生态下,行政哲学研究首先要从“谁来评判、让谁满意”的哲学高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和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决定了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必须对政府行为“为了什么”、行政改革“追求什么”等行政价值问题作出旗帜鲜明的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创新行政哲学价值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绝不能仅仅根据管理学的技术性标准和方法去建构行政哲学,而应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行政运行价值论的根本目标,将流程再造、机制创新、能力提升、质量改进等视作落实政府“放管服”改革的途径。

五是坚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取向的价值规范,切实解决好行政行为中公平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机统一的问题。行政哲学研究固然不排除对效率价值的重视,但是首先要贯彻好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着重回答:政府怎样在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同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政府怎样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坚守公共伦理,超越自利性诱导的诱惑;政府怎样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建立保障机会平等和包容差异的制度平台。

象化的研究态度,支持经典诠释的立场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总体来说,当前经学研究的独立性慢慢凸显,这体现在研究范式、所注重的文本、人才培养理念与研究队伍等多个方面。

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与道教研究热以来,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近十几年又有新进展。就研究视角而言,有生态、科技、女性观、民俗学、伦理学等。人物研究以庄子居多;道教教派研究以全真教为热点;地方性道家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当然,道教研究今后还需在宗教比较、道教义理等方面加强。此外,由于近20年来新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如郭店楚简、北大汉简,许多文本得到准确注疏与重新诠释,尤其是《老子》与黄老学派。今后,新出土文献仍将继续对道家哲学及整个中国哲学文本的新诠释发挥作用。

承前启后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无论是在传统哲学的普遍性价值之现代化发掘方面——如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传统政治哲学中的现实及其人性基础,还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与互释、哲学系统的新建构方面,无不如此。而民间国学热与经学研究的兴起则更是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活”的。

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日益融通。中国文化及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文化土壤。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等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日益融通。

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公德及健康的心理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努力,努力挖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方法,并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承办的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2018年学科建设研讨会,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新时代我国哲学创建一流学科的问题和对策”。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东南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教育部社科委哲学部委员和特邀专家近50人与会。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哲学部召集人陈先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分别致辞。开幕式由教育部社科委哲学部秘书处秘书长郭湛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学者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在实际学科建设遇到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目前哲学一流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

首先,在新时代,我们应对一流学科的标准进行反思。贺耀敏教授在致辞中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创建一流学科不是让我们的头脑像外国人一样思考,我们的大脑也不是要跟着西方的步伐亦步亦趋。以往对一流的衡量标准,主要是借鉴西方的。如何能制定出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又与我国文化传统相契合的衡量标准,是我们今天建设一流学科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其次,哲学学科发展在整体规划和具体规划上还需进一步调整。在哲学学科规划方面,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首先要思考哲学学科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任务是什么。关于具体学科规划和建设,陈先达教授说,哲学门类下二级学科繁多,相应产生的问题就是各个二级学科间发展不平衡。所有二级学科,都涉及中哲、西哲和马哲三个学科,如何处理好马哲的主导地位和中哲、西哲及整个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再次,现有学科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指出,现有评价体系存在着唯数量、唯英文发表的弊端,相应产生的人事制度有唯唯乎、唯留学经历的倾向,这就造成了对学科的自我否定。

最后,学术成果在现实中的转化应更为深入。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生活需求还不太适应,有的甚至存在一定反差。行政方法改革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行政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创建哲学一流学科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关于一流学科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应的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应该经历自己的转折。吴晓明教授认为,学术真正的成熟必须经历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转折。哲学的任务是给自身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自我主张”的尺度。这种尺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把从外国学来的东西,结合中国现实和本土思想,转化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二是要研究中国社会,深入中国现实。

所谓一流学科,还应当走向世界。贺耀敏教授指出,创建一流学科,要把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推向世界。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说,提高国际对话的能力,也就是在一些学术的规范性上,要和国际接轨。

一流学科还应当具备优良的师生队伍。陈先达教授指出,一流学科首先要有好的教师队伍;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合格的学生,一流学生的标准就是一流学科的标准。关于师资队伍建设,郝立新教授认为,要处理好国外师资引进和国内培养之间的关系的,并且要尽快让从国外引进来的师资队伍接轨国内发展,了解中国现实。(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

创新中国特色行政哲学研究的逻辑理路

□ 张雅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给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作为引领行政改革和行政运行的价值论和方法论,中国行政哲学亟待回答现实问题中不断创新、在新时代变革中走在前列。然而,面对当前行政改革中涌现出的大量现实问题,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往往缺乏厚重的解释力和回应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任务落地,深入细致做好工作衔接,迫切呼唤中国行政哲学在彰显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中实现研究创新。

本体论创新:深入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规范及与其他行为主体的逻辑关系

哲学本体论是关于事物本源与本质的探究,是构建任何领域的哲学体系首先要回答的“元问题”。作为一门现代应用哲学,行政哲学以现代政府规范和政府行为为研究对象,旨在追问“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政府”的问题。这样一种本体论,具有基础性 and 引领性意义,这也是创新中国特色行政哲学研究首先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事物的本源与本质是客观的,但人们把握事物的本质、获得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是动态的、不断深化的。中国特色行政哲学本体论创新,就是要紧跟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实践步伐,尤其要追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轨迹,对行政主体的本质属性、行为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准确阐释,从而进行哲学概括和理论抽象。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在阐释和回答这一根本问题

上显得力度不够,尤其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新进程中的政府角色、行为规范、运行逻辑等缺乏规律性的深度研究和透彻阐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行政哲学研究的一个“软肋”。

以政府职能定位和行为规范为对象的中国行政哲学,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是政府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正在形成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合理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的复合系统与行为过程。而西方行政学理论中的“政治—行政二分”的研究原则和管理主义的单一度研究取向已很难解释和回答中国行政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就倒逼着中国行政哲学必须根据国家治理复合性特征,在本体论上进行思维转换和理论创新。

价值论创新:重点探讨我国政府行为和行政改革中的价值追求、价值规范与价值标准

公共行政作为一种管理公共事务、服务社会公众的实践过程,首先涉及国家治理和治理理论现代化的改革轨迹,对行政主体的本质属性、行为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准确阐释,从而进行哲学概括和理论抽象。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在阐释和回答这一根本问题

在西方价值观的头上戴上一顶美丽皇冠而已。我国正处在中国大发展之中,各级政府一方面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又要在多样化社会中平衡利益、化解冲突、维护公平正义。因此,如何在顺应现代市场需要进行制度改革、机制创新和技术完善的同时,树立起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的时代课题。

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自上而下普遍展开的政府“放管服”改革,为创新中国特色行政哲学价值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原材料。根据改革新经验,中国特色行政哲学创新亟须深入回答三个基本价值问题: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切实解决好行政运行中公共力量,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合理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的复合系统与行为过程。而西方行政学理论中的“政治—行政二分”的研究原则和管理主义的单一度研究取向已很难解释和回答中国行政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就倒逼着中国行政哲学必须根据国家治理复合性特征,在本体论上进行思维转换和理论创新。

二是坚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取向的价值规范,切实解决好行政行为中公平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机统一的问题。行政哲学研究固然不排除对效率价值的重视,但是首先要贯彻好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着重回答:政府怎样在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同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政府怎样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坚守公共伦理,超越自利性诱导的诱惑;政府怎样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建立保障机会平等和包容差异的制度平台。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切实解决好行政实践中维护公共权威和提高政府公信力有机统一的问题。政府绩效评价标准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评判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创新和工具改进的问题。因此,西方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和政绩评价标准,对提升中国政府的行政科学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绝不可奉为圭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生态下,行政哲学研究首先要从“谁来评判、让谁满意”的哲学高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和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决定了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必须对政府行为“为了什么”、行政改革“追求什么”等行政价值问题作出旗帜鲜明的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创新行政哲学价值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绝不能仅仅根据管理学的技术性标准和方法去建构行政哲学,而应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行政运行价值论的根本目标,将流程再造、机制创新、能力提升、质量改进等视作落实政府“放管服”改革的途径。

四是坚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取向的价值规范,切实解决好行政行为中公平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机统一的问题。行政哲学研究固然不排除对效率价值的重视,但是首先要贯彻好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着重回答:政府怎样在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同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政府怎样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坚守公共伦理,超越自利性诱导的诱惑;政府怎样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建立保障机会平等和包容差异的制度平台。

五是坚持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取向的价值规范,切实解决好行政行为中公平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机统一的问题。行政哲学研究固然不排除对效率价值的重视,但是首先要贯彻好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着重回答:政府怎样在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的同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保障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政府怎样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坚守公共伦理,超越自利性诱导的诱惑;政府怎样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建立保障机会平等和包容差异的制度平台。

六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切实解决好行政实践中维护公共权威和提高政府公信力有机统一的问题。政府绩效评价标准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评判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创新和工具改进的问题。因此,西方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和政绩评价标准,对提升中国政府的行政科学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绝不可奉为圭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生态下,行政哲学研究首先要从“谁来评判、让谁满意”的哲学高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和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决定了我国行政哲学研究必须对政府行为“为了什么”、行政改革“追求什么”等行政价值问题作出旗帜鲜明的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创新行政哲学价值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绝不能仅仅根据管理学的技术性标准和方法去建构行政哲学,而应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行政运行价值论的根本目标,将流程再造、机制创新、能力提升、质量改进等视作落实政府“放管服”改革的途径。

